

一、「財富不足以動我的心」

孫中山在翠亨村毀像瀆神，並在香港受洗入基督教的事情，不久都被在檀香山的孫眉所獲悉。孫眉極為不滿，他很生氣地寫信痛加斥責，警告孫中山如不與基督教斷絕關係，就要終止經濟支援，不再供給他的學費。但孫中山毫不理會。孫眉接著採取了第二個步驟，他又寫信給孫中山，佯稱在檀香山的生意遭到失敗，如今要另謀生路，但因過去有的商業財產用了孫中山的名義，故需他急速前來商量解決。這樣，就在救國思潮激蕩於孫中山胸懷之時，他應孫眉之召，於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在香港輟學赴檀香山。

到檀香山後，孫中山在茂宜島姑刺埠牧場見到了孫眉。兄弟二人，因信教觀念的不同，發生口角，雙方各執一端，爭持不下。一時間，覺醒與懵懂，思變與循舊，憂國與齊家難以協調，兩人都怒火中燒，情緒激動。在極其沉悶的氣氛裡，他受到脾氣暴躁的哥哥嚴厲的斥責和打罵，說他任性妄為，貽羞家庭，並言這樣輕舉妄動，有了金錢適足為累，因此宣佈要收回一八八二年間立約分給他的一筆財產。在孫眉看來，除用這一辦法相要脅之外，沒有別

的辦法能迫使其放棄宗教思想，使弟弟馴服。然而，使孫眉吃驚的是，這一嚴厲的懲罰，並沒有使孫中山退縮。面對信仰與財富的取捨抉擇，他不改初衷，表示絕難遵守腐朽的習俗，而是毫不猶豫地同意放棄已得的財產所有權，並坦誠地申辯說：

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國古人所走的路上盡我的責任，如果我的良心允許我，我也願意遵守中國的法律做事……但是，中國自己並不能盡自己的責任。我不能遵守已敗壞的習慣，你所很慷慨給予我的產業，我很願意還給你，我不再有什麼要求，財富不足以動我的心。²³

辦理完退還全部財產的法律手續之後，孫中山被孫眉安排到茄荷蕾埠開設的商店裡去當店員。孫中山去商店學做生意並非所願，雖能忍讓一時，終覺負氣難言。他勉強幹了三個月，翌年春便設法脫離那裡，準備動身回國。他先請姐夫楊紫輝（即孫妙茜的丈夫）幫他歸國升學，沒有如願；便又跑到火奴魯魯去，向過去奧阿厚書院的教師、美國傳教士芙蘭蒂文（F. W. Damon）以及舊日同學鐘工宇等求援。師友們為他籌集到三百美元的贈款，他便帶上這筆路費於一八八五年四月離開檀香山經日本返國。

23 林百克：《孫逸仙傳記》，上海三民公司一九二六年版，「不愛錢」節。

當孫中山在火奴魯魯行將啟程歸國的時候，孫眉聞訊曾趕去阻攔，但孫中山堅定地表示要回國，絕不再留在檀島。當時，他還充滿信心地向一位朋友表示：「我回到中國後，一定要謀求在學業上有成就。」

孫眉雖然認為孫中山從事的信教等活動是「胡作非為」，可回想到弟弟的性格亢直，又深悔對他督責過嚴，並因處置太重而感到內疚。因此，便立即寫信給他的父親說明情況，並匯款支援孫中山繼續讀書。

同八月，孫中山離開家鄉再赴香港，回到中央書院復學，並在一八八六年夏季他二十歲時修完了中學課程。

二、升學方向的抉擇

在香港中央書院高中畢業後，孫中山面臨著選擇未來職業以繼續深造的困惑。他曾對升學就業問題十分躊躇，進行過一番仔細考慮。正像大多數青年人一樣，他對未來也有著美好的嚮往和憧憬。

早在一八八三年，孫中山在香港拔萃書室讀書時，就已經考慮著自己終身職業的問題了。當時，有一些朋友勸他捐個一官半職，走入官場；後來，檀香山的另一些朋友希望他投考神學院，將來做一名佈道救世的傳教士。而孫中山自己，則在中法戰爭中國不敗而敗的刺激中，認為學軍事可以救國，為了抵禦外侮，一度想投筆從戎。他希望做個海軍軍官，報考海軍學校，

但當時中國南方唯一的海軍學校福建馬尾水師學堂已遭法軍炸毀而停辦，使他無法實現從軍報國的願望。繼之又想研習法律，期望做一名主持正義的律師，也因當時中國尚無法律學校而作罷。在這期間，在中法戰爭中有關傷患慘狀和應用西方醫學進行搶救的報導，給了孫中山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幾經思考熟慮，終於決定了學習醫科。

孫中山認為「醫亦救人苦難術」²⁴，且「行醫最能為功於社會」²⁵，可以通過戰勝疾病，立己濟人，保障國民健康，使國家強盛起來，所以應該從學醫著手進行拯救祖國的活動。

孫中山對醫學的興趣和念頭，還應追溯到他在檀香山讀書的時候。據《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周年紀念史略》一文記載：孫中山在檀香山時，「日往訪教會司鐸杜南山君，見其架上有醫科書籍，問何以需此？杜答謂：『范文正公有云：不為良相，當為良醫，竊采此意耳。』公（指孫中山）領之。」

杜南山的這句話對孫中山的啟發很大。他經過思考後，第二天又到杜家，對杜南山說：「君為我奉范氏之言，竊以為未當。吾國人讀書，非驟能從政；即從政矣，未必驟秉國鈞。倘殫心力以求作相，久不可期，然後為醫，無論良醫不易為，即努力為之，晚矣！我意一方致力政治，一方致力醫術，懸其壺以求之，庶有獲也。」他的意思是要政治與行醫二者相並而行才好。杜南山默默地聽著，十分欣賞這個年輕人思考問題的能力。由此可見，孫中山「救

24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三百五十九頁。

25 馮自由：《孫總理信奉耶教之經過》，《革命逸史》第二集，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六年版，第四頁。

國學醫所行之志，已肇於此時矣」。

孫中山決定學醫後，在一八八六年秋季，經過喜嘉理介紹，以減免學費的優待，進入了美基督教長老會所辦廣州博濟醫院附設醫校（今廣州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學習。

三、入廣州博濟醫院醫校學醫

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創辦於一八三五年（清道光十五年），是美國公理會及長老會為「醫療傳道」之目的而設立，為東方各國西醫西藥之鼻祖，也是在中國創立的第一所西式醫院，由此才開始有正式的「傳教醫生」（Missionary doctor）出現。咸豐五年（西元一八五五年）附設醫學堂，最初僅收男生。該院除為病患醫療外，並設有宣教所，同時負有向病人傳播福音的使命，所以醫師或護理人員都須接受神學的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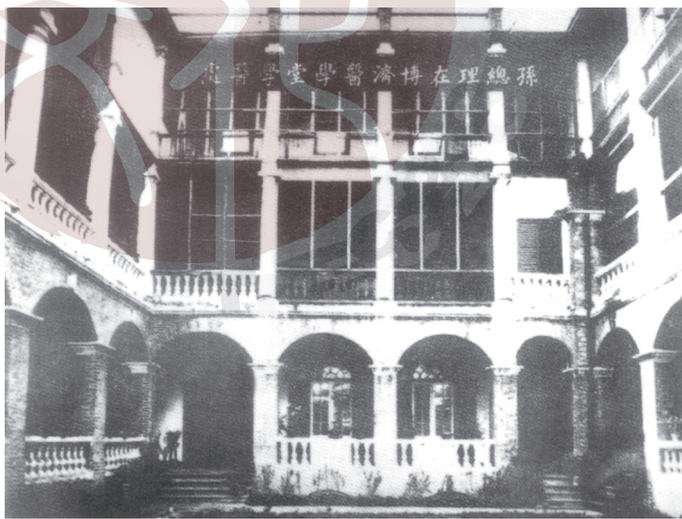
孫中山入學時，有同學男生十二人，女生四人，男女合班上課時，必須分開左右兩旁而坐，中間掛有幔帳區隔。有一次，教師帶領同學們到婦產科臨床實習，只許外國籍的學生去實習，不許中國學生參加。當時，孫中山對此大為不滿，竟與教師爭執起來，鬧到校長嘉約翰辦公室。校長詢問原因，孫中山答曰：「同是學生，為什麼歧視我們中國人，不許往婦科學習？」校長說：「你們中國人向來男女授受不親，有禮教之防，我們美國人則無須拘此。」孫中山問：「學醫是否為治病救人？」校長只好答：「是。」他又理直氣壯地問：「那麼，中國學生學醫不是為了治病救人嗎？中國婦女有病，中國醫生能不救嗎？究竟以救命為重，還是以不合理

的禮教為重？」問得校長無言以對，自知理屈，從此也允許中國學生診查婦科，並且將課堂間隔的男女生之間的幔帳也撤除了。

還有，該校在產科學習時，只限女生參加，男生則排除在外。孫中山極不以為然，當面向校長嘉約翰教師建議：「學生畢業後行醫救人，遇有產科病症也要診治，為了使學生獲得醫學技術，將來對病人負責，應當改變這種不合理的規定。」開明豁達的嘉約翰校長認為這是合理的要求，遂採納他的建議。自此以後，男生便能參加產科的臨床實習。後來，孫中山行醫時，婦產科乃是其專業特長之一。

孫中山提出這一建議，和他少年時反對姐姐妙茜纏足一樣，表現出不能容忍社會上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存在，敢於反對所有愚昧落後的品格。

孫中山入博濟醫院附設醫校後，住哥利支堂十號宿舍。他在校學習期間，自奉甚簡，布衣粗食，半工半讀，勤奮異常，除攻讀醫學外，仍很重視研究古代文史書籍，曾延請了一位



廣州博濟醫學院附屬醫校—南華醫學堂（局部）。

國文教師陳仲堯教授中國經、史，他在課餘便到陳仲堯寓所受業。他對經史加意研求，特自購置了《二十四史》和《四書》書籍。這時的學習生活情形，據他當年的同學憶述：孫中山「年少聰明過人，記憶力極強，無事不言不笑，有事則議論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語。竹床瓦枕，安然就寢，珍饈藜藿，甘之如飴」²⁶。

在學校裡，孫中山結識了一個和「會黨」有密切交往、廣東反清秘密組織三合會會員的同學鄭士良（一八六三—一九〇一年，原名安，字弼臣，廣東歸善即今惠陽縣人）。會黨是封建性的舊式秘密結社，成分相當複雜，其成員主要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和失業手工業工人，其中有的會黨組織具有反對清封建王朝的政治要求。鄭士良「為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納多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孫中山和他談論政局，甚為投機。鄭在一八八八年從博濟醫校輟學後，返回家鄉，聯絡會黨，被推為三合會首領，是以後興中會的重要骨幹和反清起義的領導人員，也是孫中山早期革命的親密戰友之一。以後孫中山在革命過程中聯絡會黨起事，得到鄭士良很多幫助。

四、轉學香港西醫書院深造

孫中山自述道：「余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余以其學課較優，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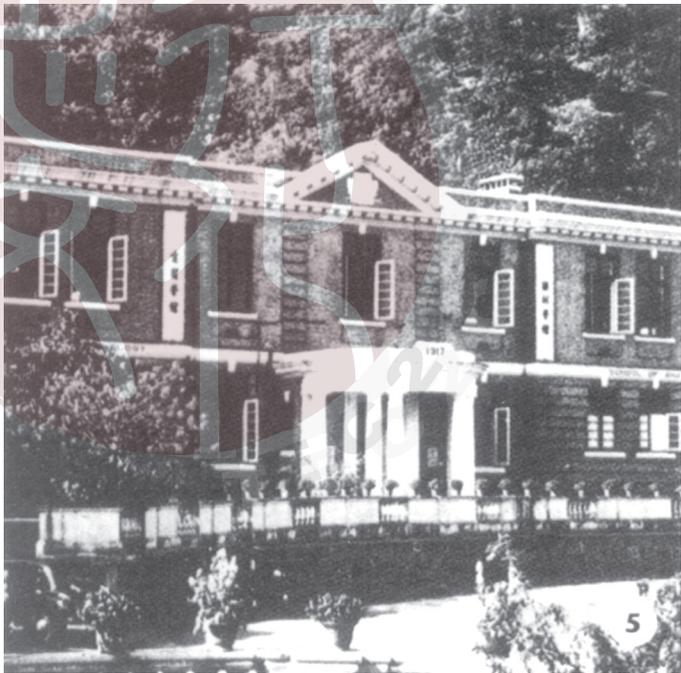
比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²⁷《他所說的英文醫院，即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香港大學醫學院前身）。

先是，一八八七年一月，香港議政局議員、又兼律師兼醫生的何啟（一八五八—一九一四年，字迪之，號沃生，廣東南海人），為紀念其亡妻英人雅麗氏（Alice Walkden），在香港荷李活道創辦了雅麗氏醫院，於當年二月中旬開業。該醫院的中文稱為：「利濟醫院」，意謂「上帝以利益濟人」。它原系太平山之倫敦教會「贈診所」，其性質與廣州博濟醫院一樣，同為傳教而免費施診贈藥。嗣因業務需要日增，於十月又在醫院內開設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派人到廣州招考能諳中、英文的新生。孫中山有感於該院師資、設備皆優，且香港較為自由，發表政治言論少受束縛，便於同年九月轉學到該院就讀。

西醫書院採用英國醫科的五年學制，教學設備較完善，師資水準較高，直接用英語教學。除上課講授外，尤其注重臨床實習，學生經常在雅麗氏醫院門診室和藥房擔任外科醫生及藥劑師的助手，上化學課時還常到植物園參觀和在化學實驗室從事化驗。孫中山在同學中年紀較長，功課成績甚好，人緣又好，被推選為班長。師長們出診時，常約他陪診，作為助手，從而更增加了學習的機會。

孫中山在這所高等學校學習了整整五年。在這五年時間內，他除刻苦鑽研醫學本科知識外，還廣泛研讀西方國家的政治學、軍事學、歷史學、物理學、農學等，尤其愛讀《法國革命史》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這兩部書對他影響很大，他期望從中找到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鑰匙。它們使孫中山接受了達爾文學說中的積極進化論和歐美資產階級革命的天賦人權理論，從而嚮往著法、美的共和革命，在思想上日益積累著在中國實行反清革命的因素，為其以後的政治活動奠定了基礎。

同時，他在課餘仍很重視進修中文，經常秉燭夜讀，並先後獲得王孟琴、陳仲堯兩位教師的輔導。孫中山後來曾對他所涉獵的知識範圍，作過這樣的概述：「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癡達文之道，而格致



一八八七年九月，孫中山轉入的香港西醫書院（今香港大學醫學院前身）校舍。

政事亦常流覽。」²⁸「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遊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²⁹

康德黎博士 (Dr. James Cantlie)，在西醫書院成立時自英國前來執教，後來接替孟生博士 (Dr. Patrick Manon)，出任第二任教務長。他在西醫書院見到的第一個學生便是孫中山。康德黎十分喜歡這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師生關係十分融洽。他引導孫中山善愛科學，向著名的科學家學習。孫中山熱愛達爾文的學說，與這位老師的啟發誘導是分不開的。康德黎說在其所教的二十四名學生中，孫逸仙對我最具吸引力，因為他的品質文雅，勤奮求學；不論在學校或私人生活都表現如紳士般的儀態，他實在是其他同學的模範。後來，他還曾這樣稱讚道：「我從未認識像孫逸仙這樣的人，如果有人問我所知的最完美者是誰，我將毫不遲疑地指出孫逸仙。」³⁰

當時，孫中山在香港讀書的學費，是由孫眉自檀香山匯款資助的。有時匯票不能按時寄到，他為購買書籍等物，只好暫時掛賬；可是匯款一到，立即清償，同時邀約同學餐敘，大快朵頤。等到把錢花得所剩無幾，他就索性待在校裡，用功讀書，心無旁騖。後來他獲得了

28 《覆翟理斯函》，佚名編：《總理遺墨》影印本，第四頁。

29 《上李傅相書》，《萬國公報》月刊，第七十冊。

30 張緒心等：《天下為公——孫中山先生及其革命思想》，第二十一頁。

工讀的機會，每個學期都有獎學金可拿，就不再仰賴哥哥的供給了。

孫中山工讀，緣以香港屈臣藥房的主人夏菲士病情嚴重，特聘康德黎診治。康氏便選拔了孫中山和江英華兩個高才生充當夜間的特別看護，分別值班上半夜與下半夜。病人痊癒後為感謝對自己的照顧，便捐出一筆鉅款充作西醫書院的獎學金。該院從中撥款一部分，幫助孫、江二人繳納學費和零用金。為了讀書，孫中山青少年求學時期，曾先後在檀香山、廣州及香港等地，當過四次的工讀生，分別在學校中具體管理校園中的蔬菜和其他雜務等工作。

孫中山在青少年時代積累的廣博的學識，不僅為他以後從事政治思想的探索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並且終生受用。他讀書又很注重於應用，在學農學知識時，就和他假日在家鄉從事的改良農業實踐結合了起來——曾為老農介紹科學選種、施肥等農學知識，並進行了考察土壤、試驗種植桑樹等活動。

孫中山在香港讀書時，課餘或節假日和週末，經常往來於廣州、澳門等地，和有救國願望的朋友共同研究學問，尋找救國真理，探索中國的出路。特別是和同住香港的志同道合的幾個知友，交遊尤密。昕夕往還，以談革命為歡，而被人視為大逆不道的寇賊。他還不斷關切政治問題，「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常對人抒發愛國情懷，闡述革新政治的抱負，用「中國現狀之危，我人當起而自救」一類言詞來提高人們覺悟。孫中山常常談起傑出的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尊稱他為「反清第一英雄」，自許為「洪秀全第二」，以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直接繼承者自任。他還利用課餘時間寫了一些論文，投送到香港教會報紙和上海《萬國公報》等處，

闡述他對於改善中國政治局勢的見解。在一八九一年前後所寫的一篇發展中國農業生產的文章中，孫中山通過對西方國家的農業組織和耕作技術的介紹，主張清政府派員出洋考察，學習西方國家「講求樹藝農桑、養蠶牧畜、機器耕種、化瘠為腴一切善法」，回國推廣，並從中央到地方採取措施以加強農業生產的領導。他還建議根據不同的自然條件，因地制宜，從事種植或牧畜。他說：「地屬高亢，則宜多種赤米……。若卑濕之田，則宜種耐水之稻……。其餘花果草木，皆宜審察土宜，於隙地廣行栽種。如牛羊犬豕之屬，皆當因地制宜，教以牧畜。庶使地無遺利，人有蓋藏。」文章最後指出發展民族經濟——農業和工商業是使國家富強的中心課題，「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巨細畢賅，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也」。這在客觀上也正是對洋務派思想的批評。

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歷年的考試成績，均名列前茅。一八九二年七月（清光緒十六年六月），他參加了第五學年考試，又獲全級第一。孫中山歷年成績總匯，在十二門課程中成績得優等者十門，及格二門，總成績是「最優異」，他以全校之冠的優秀成績畢業了。在同月二十三日舉行的畢業典禮上，他接受了教務長英國人康德黎（J. Cantlie）頒發的西醫書院第一名畢業執照，並獲得《嬰孩與兒童之病症》、《外科腎症》和《神經之損傷與病症及其治療》三書作為獎品。畢業典禮結束後，康德黎又特別在家裡設宴為畢業生孫中山和江英華二人慶賀，應邀作陪者五十人，師生歡談，氣氛至為熱烈。

至此，孫中山結束了他的大學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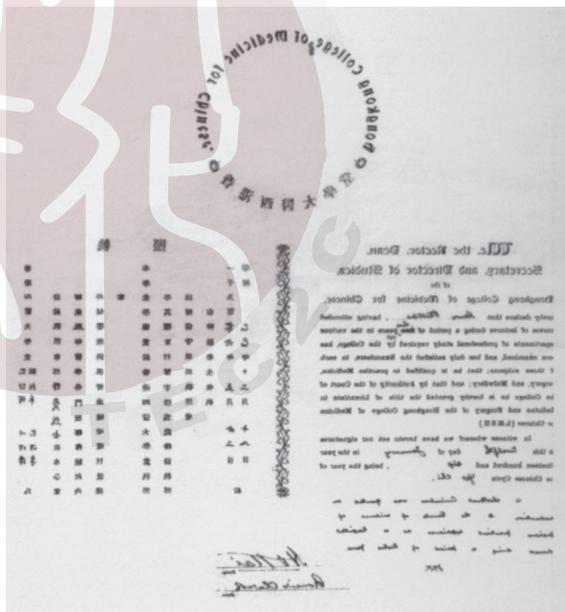
大學時代是孫中山一生中不可忽視的階段。如果沒有這六年的勤奮學習、刻苦鑽研，在學習自然科學的同時，熱心研究社會科學，並參加實踐，廣交愛國志士，從而奠定了較堅實的基礎，孫中山就難以在一八九四年成長為一位民主革命家。

總起來說，從十二歲到二十六歲，

孫中山在學生時代接受西方資本主義教育共十四年之久。在這期間，作為一個積極向西方學習，探求救國真理的青年，他學到了不少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也接觸了資產階級的一些社會政治學說，使他嚮往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與此同時，國內外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生動事實，也給予孫中山以積極的影響。這些，對於他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

至於孫中山西醫書院畢業時是得了什麼學位的問題，說法不一。目前，海內外有關孫中山的著述中仍有著不同的說法，宜予辨證說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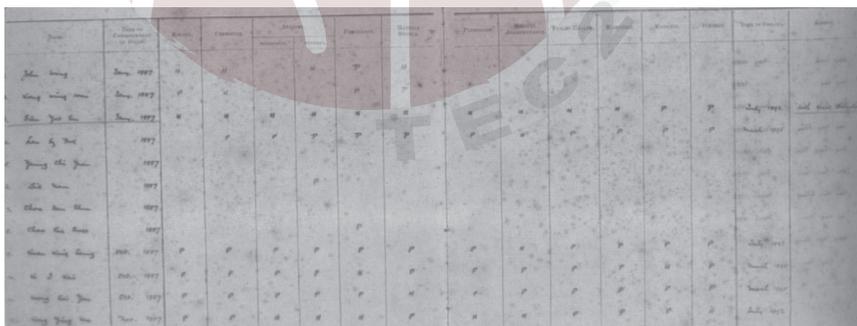
長期以來，「孫逸仙博士」的稱謂流傳甚廣。一九三五年，原博濟醫院舊址（今廣州中



一八九二年七月，孫中山以優異成績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圖為他的畢業證書。

（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豎立的紀念碑，雕刻有「孫逸仙博士開始學醫及革命運動策源地」等字樣。博士之稱實際是一種誤會。《倫敦被難記》的中文本提到孫中山西醫書院畢業一事的文字為：「閱五年而畢業，得醫學博士文憑。」但查對一八七九年倫敦出版的英文原著，這一段作“After five years study (1887-1892) I obtained the diploma entitling me style myself Licentiate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Hong Kong”³¹。可譯成：「經過五年（一八八七—一八九二年）學習之後，我領得有資格在香港開業行醫的畢業文憑。」並無博士的字樣。

羅香林在《國父大學時代》一書中，有的地方稱孫中山獲得的學位是學士，有的地方又說是碩士。如該書敘述康德黎在畢業典禮上演說完畢後，即頒發國父與江英華二人成績優秀之畢業執照，內載中英文證明文句，大意相同，唯英文方面增加「並由書院當局授予香港西醫書院醫



Year	Name	Subject	Grade
1887	Sun Yat-sen	Latin	First
1887	Sun Yat-sen	Mathematics	First
1887	Sun Yat-sen	Science	First
1887	Sun Yat-sen	History	First
1887	Sun Yat-sen	Geography	First
1887	Sun Yat-sen	English	First
1887	Sun Yat-sen	Chinese	First
1887	Sun Yat-sen	Logic	First
1887	Sun Yat-sen	Metaphysics	First
1887	Sun Yat-sen	Psychology	First
1887	Sun Yat-sen	Philosophy	First

一八八七年孫中山的大學成績單（見畫線處）。其中有十門課獲得優異成績。

學及外科等碩士 (Licentiate) 之學位稱號」。其實 Licentiate 在這裡並無碩士的含義，只是有開業行醫資格者的意思。揆諸事實，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五年，只有本科考試成績，僅能授予學士學位，迄今尚未發現孫中山碩士或博士學位的考試成績、論文及答辯情況等資料。

事實上，西醫書院當時尚屬草創階段（一八九二年才轉入正軌），是沒有資格授予博士或碩士學位的。康德黎在頒發證書時說得很清楚：「今日對在座青年同學頒發准許各位為書院信譽而從事醫藥與外科及產科醫師職務的證書執照，乃一較任何事情為感覺興奮的事。這種學士證書執照的獲得，用各位過去五年在書院努力工作，而今日僅得發展初階的結果，且顯示為書院開創新紀元。因為學士榮銜的獲得，在本院還是第一次呢！」³²，駐上海小田切代總領事報告。



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李蒸蒸日上畫）。

32 據《日本外務省檔案各國內政雜纂·中國部分·革命黨方面》，一九〇〇年機密受第一一六二號，駐上海小田切總領事報告。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在北京逝世，香港大學註冊部的唁電說：「此校（指香港大學——引者）可認為先生之母校」，因為孫中山「一八九二年得醫學士之阿飛斯（Alice）（即雅麗氏另譯音，原文如此——引者）紀念醫院，頃已合併於斯校矣」³³。可見，孫中山所獲得的是一般大學本科的學士學位。孫中山本人也從未提及自己得過博士或碩士學位。相反，他明確自稱醫學士。

五、大學時期的廣泛交遊

孫中山的大學時期，既是他政治上開始成熟的時期，也是他作為一個民主革命者不可缺少的思想準備的時期。這個時期與他日後革命思想的形成和革命事業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他的勤奮治學和廣泛交遊，就為他日後的革命工作準備了條件和奠定了基礎。

孫中山是個學習勤奮、成績優良的學生，但不是一個埋頭讀死書的書呆子，他並沒有一頭栽進醫書堆去，而是經常關心國家大事，懷抱救國救民的宏願。他的學習範圍遠遠超出了醫學院課程的要求，凡有關國利民福的知識都潛心鑽研，閱讀了大量與國計民生有關的各種書籍。他在給鄭藻如的信中云：「某留心經濟之學十有餘年矣，遠至歐洲時局之變遷，上至歷朝制度之沿革，大則兩間之天道人事，小則泰西之格致語言，多有旁及。」³⁴當時孫中山才

33 據《日本外務省檔案各國內政雜纂·中國部分·革命黨方面》，一九〇〇年機密受第一一六二號，駐上海小田切總領事報告。

34 黃彥編《孫文選集》中冊，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一頁。

是個大學三四年級的學生，課外學習的範圍卻已如此廣闊。稍後，他在上李鴻章書中，談到自己「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睦領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闡奧」。³⁵孫中山這些表述，參照與孫中山同學五年並同住一室的關景良的回憶所云：孫中山白天學科學和醫術，夜間則攻讀中文，特別喜歡中夜起床讀書，最愛讀的是《法國革命史》和進化論諸書。他常將地圖掛在牆上，頻頻注視，深深慨歎美好江山付之非人等的情況，證明其言並無虛誇。正因為孫中山有遠大的抱負，所以，他除學好醫科的各项課程，如生理學、解剖學、病理學、外科學、產科學等以外，還閱讀了大量中國古代典籍及西方政治、經濟、科技方面的著作，知識面是寬廣的。

關於孫中山在大學時期的廣泛交遊情況，是他讀書時期值得記述較多濃重的一筆。

當時，孫中山有意識地結識一批有革命傾向的知識青年，交流個人的政治抱負與愛國理想。他所交遊的人群中，既有同學、老師，又有士紳等不同類型的人。他們政治面貌雖然不同，但不乏進步、開明甚至抱有反清思想的人士，並分別對孫中山思想的發展及早期的革命活動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還形成了一個沒有組織形式而有共同反清願望，以他為核心的政治小團體。

當時，孫中山與之交往最密切的，首推「四大寇」中的陳少白、尤列、楊鶴齡三人。

陳少白（一八六九—一九三四年），廣東新會人，自小就從叔父處獲得「西學譯本多種」，因而「知世界大勢，發生國家觀念」。

一八八九年，他在廣州新辦的格致書院就讀，因家境日漸困難，預備到香港去半工半讀，經區鳳墀介紹，開始與孫中山相識。兩人一見如故，「談談時局，覺得很入港，談到革命的事，也是很投機」³⁶。第二年，陳少白在孫中山引薦下，得到康德黎同意，進入西醫書院就讀。兩人關係是十分親近的，據馮自由在《革命逸史》初集中說，在孫中山肄業雅麗氏醫



孫中山（前排右二）在香港與西醫書院同學合影。前排左起：江英華、關景良、孫中山、劉四福；後排左起：王九皋、王以諾、黃怡益、王澤民、陳少白。

院時期，及興中會成立前後，「諸同志中與總理關係密切者，以陳君為最，總理實不啻倚之為左右手」。

尤列（一八六六一—一九三六年），字少紉，廣東順德人，其祖與父都是學者，在當地是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尤列在結識孫中山以前，就遊歷過不少地方，足跡所及，內而大河南北，長江上下，外而朝鮮、日本。他還在上海加入過洪門會，又到過南京尋找太平天國遺跡。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情況下，尤列「蒿日時艱，慨然有匡復之志」，是一個見多識廣而又有愛國反清思想的青年。一八八六年夏，他開始與孫中山結識。後來，他去香港考取了華民政務司署書記的職務，這樣就使孫、尤有更多機會相聚，尤列曾從事輿圖測繪工作，又遊歷甚廣，他這方面的知識，自然會使熟悉地圖、注意山川形勢、關心風俗人情的孫中山感興趣，加上兩人同有反清思想，因而成為密友。

楊鶴齡（一八六八—一九三四年），是孫中山的同村青年，自幼相熟。楊父在香港開設了一間名為楊耀記的商店，孫中山在西醫書院時，經常到楊耀記，與楊鶴齡來往更為密切。楊鶴齡與尤列為廣州算學館同學。在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〇年間，孫、陳、尤、楊就常聚集在楊耀記商店樓上，一起「高談造反覆滿，興高采烈，時人咸以『四大寇』稱之」。孫中山這樣回憶：「余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

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余等為『四大寇』。」³⁷他的這段回憶，反映了這幾個具有愛國思想、受過西方文化教育而又渴望改造中國的青年開始尋求革命道路的情況。其時正是孫中山所說的「革命言論之時代」，它醞釀著向革命行動時代的過渡。

孫中山早年已認識的陸皓東和鄭士良，也是當時的親密朋友。陸和孫是翠亨村孩提時的同學。一八八三年孫中山在翠亨毀壞神像，就是和陸皓東一起幹的。後來，陸皓東在上海電報局任報務員，他每次從上海回廣東途經香港時，一定要找正讀大學的孫中山暢談國家大事，並常下榻於楊耀記，與「四大寇」會見。孫中山與陸皓東的來往一直是很密切；後來，陸皓東在孫中山影響下決心參加革命，成了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位烈士。

鄭士良因父輩的關係，從小就與會黨綠林中人有交往，受到反清復明思想的影響，痛恨清朝官吏的貪污腐敗。孫中山在廣州博濟醫校讀書時，與鄭士良是同學。鄭士良「為人豪俠尚義，廣交遊，所結納皆江湖之士」。孫中山與鄭士良談到反清的事，鄭聽了以後表示悅服，並告訴孫中山，他日有事可羅致會黨以聽指揮。孫中山轉學西醫書院後，鄭士良則於一八八八年回到歸善淡水開設西藥房，繼續從事聯絡會黨的工作。在此期間，他與孫中山的聯絡並未中斷，經常到香港楊耀記與孫中山會面，極贊成孫中山的政治主張。

上述同孫中山有密切交往的陳、尤、楊、陸、鄭五人，儘管出身不同，經歷各異，但有

一點是相同的，就是他們都與孫中山一樣，是不同程度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教育、具有強烈愛國思想和反清傾向的青年知識分子。這些年輕的志士高談反清言論，仰慕反清的農民起義領袖洪秀全，他們互相鼓勵，互相促進。孫中山固然首先以自己激進的思想影響著周圍的青年朋友，但另一方面，這些青年朋友又都在不同的方面，或給孫中山以鼓勵，或增長了孫中山的見聞，或與孫中山同作日後的謀劃，總之，他們也給孫中山以影響，使孫中山增強了信心和勇氣。這對孫中山日後革命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革命活動是有重要意義的。這樣，一個以孫中山為核心的革命小團體正在形成之中。孫中山最早的革命事業都以這幾個人為骨幹，如陸皓東在一八九五年的廣州起義，鄭士良在一九〇〇年的惠州起義，陳少白於《中國日報》、創立興漢會、與康梁改良派商談等，都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大學時代的後期，孫中山還結識了香港輔仁文社的社長、後來成為香港興中會總部會長的楊衢雲（一八六一—一九〇一年，原名飛鴻，福建海澄人）。楊衢雲生於一個有種族意識的知識分子家庭，自小隨父在香港學英語，後在香港任英文教員、招商局船務書記長。香港時有英國海陸軍人酗酒鬧事，凌辱毆打中國人。楊衢雲每遇這種情況，即「揮拳奮擊醉兵」，因而屢被執送警署。他常憤慨地說：「外人待我不平，同胞必須發奮圖強，其所以致此，皆因滿胡壓迫漢人，不能致中國強盛，故受外人欺侮也。」³⁸他也是與「四大寇」、陸、鄭等思

想相似的青年。約在一八九一年，孫中山與其相識後，經常談論救國大計。一八九二年，楊和一些友人組成了「輔仁文社」。孫中山當時與楊衢雲雖已認識，但交情不能與尤、陳、楊、陸、鄭等相比。而輔仁文社又並不是一個具有明顯政治目的的小團體，該組織以「砥礪品行」、「開通民智」、「盡心愛國」的宗旨，不失為一個具有進步傾向、有較多西學知識的愛國青年組織。從目前所見的資料看，除尤列外，「四大寇」中的孫、陳、楊三人均未參加該組織。其主要成員楊衢雲、謝纘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七年，字聖安，廣東開平縣人，出身於澳大利亞華僑資產階級家庭）等頗富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正因如此，孫中山後來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後回港，該社的楊衢雲、謝纘泰、黃詠商、周昭嶽等人才與「四大寇」等結合，組成香港興中會總部。

此外，孫中山還結識了一些有志於改革的維新派人士。其中對孫中山產生直接影響的，首推他的業師何啟。何啟是香港中央書院的畢業生，後赴英國學醫，畢業後再學法律，獲法律學士學位。一八八一年，何啟回香港，先行醫，後操律師業務，不久被推為香港議政局議員，在香港社會是個有影響的人物。他精通西學，又是一個主張改革的愛國憂時之士。一八八七年一月，著名的洋務派外交官曾紀澤在倫敦《亞洲季刊》上發表《中國先睡後醒》一文，為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塗脂抹粉。何啟讀後，立即寫了《曾龔侯〈中國先睡後醒〉書後》，揭露清政府「政治不修，風俗頹靡」的腐朽狀況，指出這才是中國的真憂所在。該文要求在制度上實行改革，取信於民。認為國家之興之立在於人民，「為君者其職在於保民，使民為之立國

也；其事在於利民，使民為之興國也」³⁹。何啟還提出：「政者，屬眾人之事也」，「政者民之事而君辦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辦之者也，事既屬乎民，則主亦屬乎民」⁴⁰。對中國儒家的「民貴君輕」、「民無信不立」等民本主張，以西方資產階級主權在民的思想作了新的解釋。他明確提出中國在政治上必須改革，成為當時鼓吹改良最力的人物之一。

何啟是西醫書院的創辦人、學校的名譽秘書，並任法醫學和生理學教師。西醫書院規模不大，師生之間易於交往，何啟關於主權在民的論說，對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啟蒙作用。在何啟影響下，孫中山在大學時已喜歡寫文章，發表改革和救國的言論。孫中山在早年上書中的一些改革主張，就和何啟的某些主張頗為近似。何啟後來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抱同情和支持的態度。

另一位與大學時代的孫中山有較密切關係的早期改良主義者鄭觀應，是孫中山的同鄉，比孫中山年長二十四歲，曾是洋行買辦，在洋務派經營的企業中任過總辦、幫辦等職務。他是一個「熟諳洋務」的官員，又是一個頗具愛國思想的維新人物。孫中山通過好友陸皓東的介紹相識後，兩人經常交談對時局的看法及學習西方的主張。後來，鄭觀應曾為孫中山上書李鴻章一事函請盛宣懷向李鴻章推薦，說明鄭觀應對孫中山是瞭解和熟識的。

孫中山與西醫書院的兩位英國教師康德黎與孟生也有密切關係。後來，一八九六年十月，

39 《胡翼南先生全集》卷三，廣州一九一六年版。

40 《新政真詮》，見《戊戌變法》（資料叢刊）（一），第二百零頁。

孫中山在倫敦被清政府駐英使館誘捕囚禁，康德黎獲訊後與孟生竭力營救，使孫中山最終獲釋。充分體現了他們深厚的師生情誼。

此外，孫中山還與同學關景良、教友區鳳墀、區鳳墀的女婿尹文楷、區鳳墀的朋友王煜初（王寵惠的父親）建立了較為濃厚的友誼，他們對孫中山的事業或生活，都給過一定的支持或幫助。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當時孫中山這種交遊為他日後形成革命團體，進行反清，具有重要的意義。「物色有志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⁴¹，這是孫中山在大學時期已開始實行的一種主張；十幾年後，他在日本對廖仲愷夫婦、馬君武等人，也曾囑告他們用同樣辦法聯絡人士以推進革命工作。後來，孫中山即以革命知識分子為骨幹，組成中國第一個民族民主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把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推向新階段。